

## 李唐里籍“河阳三城”考

蒋晓春 李东岳

**摘要:**两宋之交的杰出画家李唐,其传世名迹《万壑松风图》《采薇图》均署“河阳李唐”款。《图绘宝鉴》将李唐籍里表述为“河阳三城”,此书虽由元末夏文彦编纂刊行,但记载李唐史料的第四卷,史源当为南宋文献,可信度较高。北朝时期陆续建成的“河阳三城”,至唐、宋继续维持北城、中滩城、南城夹岸而城之形态,中以两段浮桥连锁,相关情况可由日本入华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载内容印证。成寻巡礼五台山途经河阳三城,时中滩城已毁,经考,北城位于今河南孟州市区以南之黄河滩地,南城则位于对岸,即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扣马村北黄河滩地一带。李唐赴都城东京开封前曾活动于河阳南、北二城间,故《图绘宝鉴》采信李唐里籍为河阳三城的表述,较一般认为的河阳更为准确。

**关键词:**李唐;《图绘宝鉴》;河阳三城;河阳;孟津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03-0138-07

“河阳三城”其地与宋代画家李唐最早的联系出现在元代画学著作《图绘宝鉴》中“李唐,字晞古,河阳三城人”<sup>[1]965</sup>的表述。同时,“河阳”也常被作为李唐之里籍。传世李唐画作《万壑松风图》《采薇图》均有作者李唐署款。《万壑松风图》自署“皇宋宣和甲辰春,河阳李唐笔”;《采薇图》款署“河阳李唐画伯夷、叔齐”。既有的李唐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生卒年的推定、靖康之难南渡与复职经历、传世画迹的鉴定与画风流变等问题,很多研究往往落脚为李唐如何变革了北宋山水画技法、风格、范式并开创南宋画院新风等。论者较少注意记载李唐生平的三篇宋元文献中关于其里籍记载相异的现象。因此,本文试说明这一差异的原因并论定李唐里籍。

### 一、涉李唐文献的文本构成及其差异

在涉及李唐的三篇宋元文献《画继》《画继补遗》《图绘宝鉴》中,对李唐生平与成就的记载均颇

简略,但均述及其里籍所在。《画继》所载内容主要为活动于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间画家之传记。这是最早记载李唐生平的南宋文献,但所述仅22字:“李唐,河阳人,乱离后至临安,年已八十。光尧极喜其山水。”<sup>[2]</sup>这段记载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包括了名讳、里籍、大概的活跃时间、南渡的经历、擅长的画科以及与“光尧”即宋高宗的关系。此处所述的李唐里籍“河阳”,即河阳县,今为河南省孟州市<sup>①</sup>。

如果像其他仅以姓名传世但缺乏画迹流传的画家一样,那么李唐留名于史22字并不稀奇。考虑到李唐在南宋画坛乃至整个山水画史的影响力,在历代文献中被提及的次数以及目前传世的画迹总量,这篇小传之短小着实出人意料。也许正因如此,宋末元初人庄肃所著《画继补遗》,参酌北宋画学著作《五代名画补遗》的成书逻辑,不仅关注到《画继》尚未提到的南宋画家,还补遗了《画继》已述及的一些画家的情况,李唐小传也显著扩充:“李唐,字晞古,

收稿日期:2024-08-29

作者简介:蒋晓春,男,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 230031)。李东岳,男,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安徽合肥 230031)。

河南人。宋徽宗朝曾补入画院,高宗时在康邸,唐尝获趋事。建炎南渡,中原扰攘,唐遂渡江如杭。夤缘得幸高宗,仍入画院。善作山水、人物,最工画牛。予家旧有唐画《胡笳十八拍》,高宗亲书刘商辞,每拍留空绢,俾唐图画。亦尝见高宗称题唐画《晋文公复国图》横卷,有以见高宗雅爱唐画也。”<sup>[3]</sup>对比邓椿的“惜墨如金”,庄肃把李唐的小传扩充到116字,并置于下卷之首。同时,在紧随其后的萧照小传中,还详述了李唐颇具传奇性的南渡:“靖康中,中原兵火,流入太行山为盗。一日,群贼掠到李唐,检其行囊,不过粉奩画笔而已,遂知其姓氏。照雅闻唐名,即辞群贼,随唐南渡。”<sup>[3]</sup>

对比《画继》文本已涉及的六个方面,庄肃所做的工作为:名讳方面,增补了表字;里籍方面,修改为“河南人”;活跃时间上,通过李唐在康王赵构处的活动和画院经历,提供了其更多在北宋时期的信息;对李唐南渡及其后的遭遇,叙述了更多生动的细节;擅长的画科方面,从“山水”扩充为“山水、人物,最工画牛”;而与宋高宗的关系,成为了庄肃写作这篇小传的重点,并以“高宗雅爱唐画”作为结论,印证了李唐南渡的动机,这也正是作为画院领袖的李唐为下卷之首的主要因素。《画继补遗》成书距《画继》已过百年,庄肃将李唐里籍修改为“河南”令人费解,“河阳”即黄河之阳地,即黄河北岸之意,恰与“河南”相矛盾,但此处变化是有其原因的。

《画继补遗》成书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作者庄肃是南宋遗民。而成书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图绘宝鉴》,其作者夏文彦所在的“义门夏氏”,是四代任职于元代政权的汉人官僚家族。该书的李唐小传云:“李唐,字晞古,河阳三城人。徽宗朝曾补入画院,建炎间太尉邵渊荐之,奉旨授成忠郎、画院待诏,赐金带,时年近八十。善画山水、人物,笔意不凡,尤工画牛。高宗雅爱之,尝题《长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训’。”<sup>[1]965</sup>夏文彦在南渡及与宋高宗关系的两方面新增了未出现过的信息:南渡后李唐经太尉邵渊推荐方才恢复画院职务,高宗曾为李唐的一件山水画长卷题赞。同时,夏文彦修改了李唐里籍为“河阳三城”,这也是李唐里籍的第三种说法,至此,李唐里籍成疑。

## 二、《图绘宝鉴》文本探源

审视上述三则宋元文献,能够突出地感受到文本所呈现出的原创性。三位史论家所秉持的原则是

据手头材料合理编撰,表现为三则文本互不矛盾且互有补充,后二家庄肃、夏文彦还提供了新材料。但唯有在李唐之里籍的表述上,至少在字面上,三则记述互异。纵观宋元画学文献,里籍为“河阳人”“河南人”的记载颇常见:如河阳人张赞、河阳人李迪、河南人僧智蕴等,另有河南洛阳人、河南白波人、河南登封人、河南长水人等表述。“河南”在唐宋时期一般指河南府<sup>②</sup>,仅在明代之后才作为河南省之简称;“河阳”即指河阳县<sup>③</sup>,两地隔黄河南北相望。正如《图画见闻志》对唐末画家张赞的记述:“张赞,河阳人,工画佛道人物,洛中有寺壁。”<sup>[1]220</sup>这反映了历史上河阳籍画家与洛阳绘事的密切关系。故河阳、河南二说当非笔误,则首次出现在《图绘宝鉴》中的“河阳三城”一说,或为辨析李唐里籍之关键。

此外,后出的两则文献叙述较《画继》更具体,其原因应是李唐及其传派的影响力在后世愈来愈大,相应地由他处补充李唐生平也合乎画学文献的编撰逻辑。如南宋俞成记述宋徽宗政和年间召试四方画工,以诗句为题,有善画者亦有巧思,得中魁选<sup>[4]</sup>,而明人唐志契复述此事则径称该“善画者”即为李唐<sup>[5]</sup>。至于清人厉鹗所编《南宋院画录》,李唐在书中居诸家之首,作者汇编历代文献中涉李唐之内容,并将《图绘宝鉴》相关记载辑为首条<sup>[1]2037</sup>。不过该书编成时距南宋已远,更无新说。

《图绘宝鉴》新增的内容是否准确,要先分析其书所载文本之来源。《图绘宝鉴》本系一部为鉴赏之用的品评手册,但由于其客观上保存了大量的绘画史料,且文本的构成和章节的安排都接近传统的画史,因此逐渐被视为画史类著作,《四库提要》就认为,是书“搜罗广博,在画史之中,最为详赡”<sup>[6]</sup>。美术史家于安澜先生则将《图绘宝鉴》收入其所辑《画史丛书》,选用的版本是“至正本”,即《图绘宝鉴》初刻版,夏文彦撰,刊于元至正二十六年<sup>[1]965</sup>。此外,从明代起该书屡经后人续编、续纂,并增补了一批明、清画家的内容,因此明代以来常见的通行本还有“正德本”及其衍生的汲古阁“津逮秘书本”,以及流传较广的清康熙“借绿草堂本”<sup>④</sup>,而明天启卓尔昌刊本则将书名改为《画髓玄诠》<sup>⑤</sup>。此外,“四库全书本”因底本实为孔府衍圣公藏本,其部分内容与上述诸本略有出入,据学者考证可能是失传的“嘉靖本”或“毛大伦本”<sup>[7]</sup>。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几个主要版本,在“河阳三城”的记载上,诸本皆同。

元人陶宗仪与夏文彦为友,二人同居松江<sup>⑥</sup>,过从甚密。其《南村辍耕录》卷十八有“叙画”一则,是

篇依次征引并品评自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来诸部知名论画述史之著作。在“叙画”篇末,陶氏以夏文彦所撰著作收尾,将《图绘宝鉴》与前代赫赫名著同日而语,盛赞:“其家世藏名迹,鲜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领神会,加以游于画艺,悟入厥趣,是故鉴赏品藻,万不失一。”又称赞夏氏编书“其考核诚至,其用心良勤”,这当然是《图绘宝鉴》之所以具备学术价值和权威性的重要意见。同时,陶宗仪又指出此书“因取《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续画记》为本,参以《宣和画谱》《南渡七朝画史》,齐、梁、魏、陈、唐、宋以来诸家画录及传记、杂说、百氏之书,搜潜剔秘,网罗无遗”<sup>[8]</sup><sup>372</sup>。既往论者大都以陶氏之论为本,认为《图绘宝鉴》最大的价值之一在于其保存、整理了历代画史著作,使其不致散佚失传。夏文彦在自序中也坦言,其书“以《宣和画谱》附之他书,益以南渡、辽金、国朝人品,刊其丛脞,补其阙略,汇而成编”<sup>[1]</sup><sup>795</sup>,承认了搜罗前人记述,以他书补缀成书的做法。金维诺先生逐一分析了《图绘宝鉴》各个章节的文本来源,他认为第四卷<sup>⑦</sup>“除采自《画继》《画继补遗》外,主要依据的是《续画记》”。《图绘宝鉴续编》明人滕霄所撰序言称:陈德辉《续画记》“自高宗迄宋终,凡百五十一人”<sup>[1]</sup><sup>1034</sup>。据此,金维诺进一步考察了《图绘宝鉴》第四卷除去来源相对清晰的画家条目,所载画人恰在150位左右,且其文体结构完整,统一。同时,夏文彦汇编其他画学著作时,大体的编排次序和行文结构一般仍依原书。因此,“可以肯定这一部分就是《续画记》的原文,其中只是小有删节而已”<sup>[9]</sup>。

《续画记》,陈德辉著,已佚。陈氏乃宋末元初人,但其书其人更多信息不传。陶宗仪认为,《画继补遗》和《续画记》二书,“仅可考阅姓名,无足观也”<sup>[8]</sup><sup>368</sup>。谢巍据此认为:“盖是书记载不详,较为简略,因此《图绘宝鉴》卷四小传,凡文字简短者,殆为《续画记》之文。”<sup>[10]</sup>至于文字相对翔实的,谢巍认为可能出自《南渡七朝画史》。韩刚在考证南宋画院情况时,统计出《图绘宝鉴》提及“画院”57处,除去《画继补遗》出现的26处,他认为其余31处当出自《南渡七朝画史》<sup>[11]</sup>。

《图绘宝鉴》这种从他书搜罗而来并加以补缀的汇编方式,余绍宋曾予以批评:一是内容“颇嫌芜杂”,各卷从各处所“剽”段落,“俱未注所出”;二是内容“仅分朝代而不按画人时代重为编次”,这也是“其最疏失者”,又叹曰,“此但求省事,苟且成书之弊也”;三是作者“欲自成一家言”,但“绝无订补”,

因此“亦不足取”;最后,认为后人续补该书,是“欲附其骥尾”,因为该书“向为艺林珍重,明以后论画之书多喜征引”,这就导致《图绘宝鉴》“数百年来久享盛名,无人为之论定,亦可异也”<sup>[12]</sup>。不过余绍宋的观点,尚不能埋没此书征引材料广博的优点。

名迹《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卷末有黄公望自跋,落款云:“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夏氏知止堂”即夏文彦家族所建之“知止堂”<sup>[13]</sup>。夏氏家居元末松江府城东里仁桥一带,堂号取《道德经》“知止不殆”之意曰“知止堂”。余辉通过考察《图绘宝鉴》在成书质量上的前后差异,推测了夏文彦编撰《图绘宝鉴》时的写作状态,他认为“在完成第三卷,进入撰写第四卷时,他在城里的资料库被焚”,“南宋画家未被系统记述”,“使第四卷、第五卷出现了一系列问题”<sup>[14]</sup>。所谓“资料库被焚”,即元末江南一带各方势力交战酿成的“松江之变”,当时松江府城中大火持续一月不灭,夏氏因各种原因未能带走而留在了城中宅邸的资料,想必已经灭失。

总之,诚如论者所言:“《图绘宝鉴》第四卷记录的是距离作者生活年代很近的南宋,从而使得作者在编纂此卷时具有无法比拟的资料来源优势。”<sup>[15]</sup>因此,夏文彦在编纂时如何汇总了手头这些距离南宋更近的参考资料,其实毋须深究。无论第四卷所记内容的源头出自何处,《图绘宝鉴》第四卷必然有所本,且史源为南宋文本。在夏文彦的拣选与整理后,《图绘宝鉴》的李唐条目呈现出与先出文本的差异,并纠正了个别讹误,而关于“河阳三城”的记载,虽不见后人辩证,但是一个须正视的问题。

### 三、“河阳三城”考

传世李唐款画作《万壑松风图》《采薇图》向为学界所重,二图均有李唐款识。《万壑松风图》创作于公元1124年的宣和画院时期,延续了北宋经典的主流山水画风;《采薇图》则作于李唐南渡临安后的晚年,画风已有显著变化,而李唐在上述两个时期均自称“河阳李唐”。陈高华认为“河阳在唐代曾设河阳三城节度使,宋初仍置三城节度”,“《图绘宝鉴》称李唐为河阳三城人,实即一地”<sup>[16]</sup>。

#### 1. 河阳与河阳三城之关系

关于河阳与河阳三城,河阳三城地望及其来龙去脉较为全面的研究,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珠玉在前,尝言:“河阳盖天下之腰膂,南北之咽喉也。”<sup>[17]</sup>今人宋杰所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则指出：“河阳三城故址在今河南省孟州市之南、古孟津渡口处，为北城、中泮城和南城，分别位于黄河北岸、河中沙洲与南岸之侧，其间有两座浮桥相连，是西晋至隋唐时期沟通黄河南北往来的冲要。”<sup>[18]</sup>由于“五代以降，我国的政治重心自长安、洛阳东移”，“河阳三城与孟津桥渡的战略地位亦随着逐渐衰落”，故其未再讨论北宋时期的河阳三城。实际上，迟至宋金战争时期，河阳三城三城连锁的形态，仍承担着严肃的军政功能。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军自北向南攻取怀州后抵达河阳三城一带，宋军坐南朝北，双方夹河而军。《三朝北盟会编》云：“河阳浮桥正是军马往来，河东一带惊，移人户逃避之路，宜速系之。”<sup>[19]</sup>说明此前河桥道路因宋金交战早已被宋军主动切断。面对从北岸逃难而来的数万军民，宋军于十一月十二日午时恢复浮桥，万人争渡，晚间金军前锋至，宋军不得已又烧浮桥，北城孤立无援，十四日北城破。随即金军由河阳浮桥上游河清县界处一处水势平缓河段强行泅渡黄河，南城宋军不战而溃。

《辞海》的“河阳三城”词条，对其沿革、地望等情况梳理得较为简明清晰，现将相关内容抄录如下：

（1）北中城。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筑于北岸，有二城，置北中郎府领兵戍守，因名。北齐在此置行台，北周改为河阳镇，隋移河阳县治此，唐建中后为河阳三城节度使治所，会昌后又增置孟州治此。金大定中为河水所毁。（2）中泮城。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年）筑于北中城南河中沙洲上，并置河阳关于此。宋嘉祐八年（1063年）为河水所毁。（3）南城。元象元年筑于南岸，三面临河。三城当洛阳北面津要，黄河二派流贯其间，系以河桥，自北朝历隋唐至五代，常为军事重镇。

此外，“河桥”词条也叙述了相关内容，“故址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上”，“唐通称河阳桥”，“历代屡毁屡作，北宋时尚存”<sup>[20]</sup>。

由上可知，其一，河阳三城自诞生起向为军事要冲，是洛阳地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重要，黄河北岸、河中洲、黄河南岸各有一座城址，中以河桥相连，形成连锁之势，兼具津渡与关隘的双重功能。连锁三城的河桥始建于西晋，即杜预“造舟为梁”，建河桥于富平津。三城在日常管辖与战时防御中被视为一体，可认为“三城同城”。其二，从隋移河阳县治于此，到李唐活动的两宋之交，该城曾长期存在不废。中泮城在北宋时期的情况，宋代文献屡有提及，南宋

《容斋续笔》载中泮城于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被冲毁，其后未再复建。其三，隋朝移河阳县治于北城，河阳县县廨建此、县令在此办公，唐代的河阳三城节度使治所和孟州州治也均驻北城，直到金大定年间，北城在反复遭到黄流冲击的情况下被弃。因此，严格地说，北宋时的河阳（县）并不能与“河阳三城”画等号，同时尚不明确的是，至北宋时河阳三城地望是否有变？其间是否发生过迁移？这都要从北宋对河阳三城的相关记载中寻找答案。

北宋时期的河阳三城及其周边山河形胜屡见时人笔端，其浮桥连锁、夹岸而城的形态大致如前。北宋河阳城内有平嵩阁，此楼甚高，可遥望河桥，司马光诗云“飞桥贯河渚，危阁压霜风”，李迪有“南指嵩高北太行，大河中出贯灵长”诗句可与之相证，故“平嵩阁”位于河阳后城。结合文彦博“太行太室当前后，俱是山家入望中”的描述，此“后城”应系河阳南城。诗歌文学化的语言，对于三城之地望及其具体形态、构成，仍显语焉不详。那么北宋时的河阳三城到底位于何处？李唐生活的时代，河阳之三城形势、形态如何？一位日本僧人的入华行记《参天台五台山记》<sup>⑧</sup>，因作者成寻详尽记载了其于北宋熙宁年间道经河阳三城的经历，恰能解答这一疑问。

## 2. 日僧成寻笔下的北宋河阳三城

成寻，俗姓藤原氏，日本国平安时代中期天台宗高僧，于熙宁五年四月渡海抵达北宋两浙路明州<sup>⑨</sup>。宋朝官方对成寻的入华巡礼予以多方面支持，成寻一行得以完成巡礼朝拜天台山和五台山的宿愿。成寻于当年十月抵达东京开封，谒见宋神宗，后于十一月一日自开封顺天门出发，日行夜录，极为详细地记载了五台山之旅的所经州县、所过驿铺、风物饮食、奇闻异事，成寻对穿行河阳三城渡过黄河时的记载十分详细，是考证其地望的关键文献。

《参记》第五卷载，十一月七日，成寻一行经河阳三城渡河，当晚夜宿河阳三城北城。“七日壬子，天晴。卯时，乘巩县上驷马十四，向坤方行廿四里，至永安县马铺，马十匹出替。过十二里，渡潞河浮桥，以大船十六只渡二町许桥也。过十二里，至牙庄马铺，十匹出了。过十二里，至河阳县内望仙坡马铺，十匹出了。南方见二山陵并庄严寺。过十五里，至河阳县。南北楼门广大，向北行来也，次渡黄河浮桥，先五町许，浮大船廿一只造桥。隔一里，次渡浮桥，十六大船三町许，河二分所也。过河阳驿，至孟州河阳门前，至广禅院宿。”<sup>[21]365</sup>

这段记录中的牙庄马铺，在今洛阳市偃师区山

化镇牙庄。地名中的“牙”字或取自姜子牙曾于此地驻军之义,然该村吕氏人占比最高,亦可能是源出姜姓的吕氏当地人附会。作为交通要道,此地或曾有牙人招徕生意并聚居,因以为名。马铺故址应在今牙庄村南东西走向的谷地中,此地属黄河南岸的丘陵低山,是邙山的一段。1991年牙庄村东的马洼曾出土唐墓志,云此地近邙山驿道“义堂路”。《通典》载:“天宝七载四月,河南尹韦济奏,于偃师县东山下开驿路,通孝义桥,废北坡义堂路也。”<sup>[22]</sup>即此驿路。《太平寰宇记》偃师县“废北坡义堂路”条目云“此古大驿路”<sup>[23]</sup>。大驿路即“大路驿”,《唐会要》载贞元二年(786年)十二月敕节文:“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sup>[24]</sup>明人都穆道经邙山,在其《使西日记》中指出:“山跨偃师、巩、孟津三县,绵亘余四百里,其顶甚夷,为土人耕种。”<sup>⑩</sup>邙山顶相对平坦,或许就是驿路经此的一个有利因素。牙庄村西今有古路沟村,亦可佐证这一史实。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辽使选择由河阳渡河使京,所经道路与成寻相仿,当地对驿路进行了整修,因此“河阳南至偃师,东由凤台、孝义次入巩县,最为顺便”<sup>[25]</sup>。

成寻从五台山巡礼,返程开封时,再次行经此地,但此行“非先路”。离开牙庄马铺后,一行人沿原“义堂路”向东,经油店马铺、孝义马铺、洛滨驿,至任村马铺接原路,其文如下:“至牙庄马铺,十匹出替。过十二里,至油店马铺,十匹出替。过十二里,至孝义马铺,是中路也,非先路,十匹出替。过廿里,至洛滨驿。”“大河小川皆冻厚,人马行冰上。”“过十八里,至任村马铺。”<sup>[21]443</sup>

今牙庄村东尚有南游殿村、北游殿村,与“油店”字异音同,距离大致为十里至十二里。据游殿村大姓滑氏十三世孙滑陶南在《滑氏族谱》所言,道光八年(1828年)其在开封府应试期间曾偶读一册北宋志余小书,言宋神宗嵩阴祭陵,驾宿会圣宫,一日北游山中行五七里入一村,盘桓数日,后地方官于此处建殿,游殿一名即取宋帝游乐之殿之意。滑陶南认为该村即是家乡油店村,云“当知油店二字不如游殿矣”<sup>⑪</sup>,后村名改为“游殿”沿用至今。

综上,以可确定位置的牙庄马铺为中心,可验证成寻记载的准确性,并考订河阳三城具体所在。第一,牙庄马铺以南驿路:牙庄马铺距洛河浮桥北口十二里,浮桥南口距永安县马铺十二里,则该浮桥津渡当在“奉先桥”。天圣八年(1030年)于訾玉山诏建会圣宫,为便利祭陵人员从洛河左岸行宫到右岸各陵区祭拜,訾玉山下洛河两岸新建訾店渡桥,并赐名

“奉先桥”。今洛河左岸山化镇寺沟村尚存会圣宫遗址及宋景祐元年(1034年)“新修西京永安县会圣宫碑”,距牙庄十余里。在会圣宫遗址南侧南望,可望见洛河右岸,即今巩义市回郭镇小訾殿村,距芝田镇<sup>⑫</sup>约十二里,符合成寻所述。第二,牙庄马铺以北驿路:按作者行文习惯,如进入某县境内某马铺,会在抵达该县第一座马铺时明确指出,牙庄马铺前为“永安县”马铺,后为“河阳县”望仙坡马铺,故牙庄马铺此时归属永安县辖。永安县,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析置,划巩县西部、偃师县东部、登封县北部设永安县以护宋陵。望仙坡马铺的准确位置尚不能确定,但根据“过十二里”的记载,可大致定在偃师区邙岭镇牛庄村一带。牛庄村北旧有渡口曰“杨沟渡”,又名“河阳渡”,今为杨沟村,在通往杨沟渡的路旁曾立有一通“修路碑”,碑文载:“牛家庄西北隅,旧有南北大道,为河阳渡之通衢,贵客商贾,昼夜往来,皆经于此。”<sup>[26]</sup>此外,王子晋于偃师缙氏山升仙传说就发生于当地,县内古有望仙亭、望仙桥等,或与此地名相关。在望仙坡马铺至河阳县的十五里路途中,成寻描述南望可见“二山陵并庄严寺”,二山岭应即邙山的两座山峰首阳山、虎头山,其中虎头山海拔567.5米,也是邙山的最高峰<sup>⑬</sup>。

就“河阳”这一地名而言,“阳”指“水北”,河阳即黄河北岸之地,河阳县的辖境理应仅含大河以北,成寻尚未提及渡河,却为何已来到河阳县地界呢?成寻的描述则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望仙坡马铺已在河阳县境内,距南城十五里,故据此可知,以紧临大河的南城为中心,至少方圆十五里的区域,实际上归属主体位于北岸的河阳县管辖,《元丰九域志》载治河阳县的孟州“南至本州界一十里”<sup>[27]</sup>,可与之相证。即河阳县在这一时期实是一辖境跨河的县级政区,黄河在这一河段实际上成了河阳县的内河。如成寻所述,一进南城,就算到河阳县城了,这里“南北楼门广大”,说明南城规模可观,随即成寻一直西行的大方向,要“向北行来也”了,在南城调转方向,也符合三城南北跨河的形态。连接河阳三城的浮桥,在成寻笔下有具体的数据:起先是“五町许”类似引桥的部分<sup>⑭</sup>,之后南城与中滩城之间的南浮桥由21只大船连锁而成,下桥后,步行一里穿过中滩,再过连接中滩城与北城的北浮桥,此处浮桥只需16只大船,再经“三町许”,就踏上了北岸的土地。可见,黄河在河阳中滩城一带,北岔流比南岔流略窄。据记载,随着黄河泛滥、泥沙淤积的现象日益增多,政和年间中滩甚至已直接与河北岸相连,“都

水使者孟扬言：‘旧河阳南北两河分流，立中滩，系浮梁。顷缘北河淤淀，水不通行，止于南河修系一桥。因此河项窄狭，水势冲激，每遇涨水，多致损坏。欲措置开修北河，如旧修系南北两桥。’”<sup>[28]</sup>渡河后，成寻恍然大悟到“河二分所也”，这反映出渡河前，成寻对河阳地有三城及其构成一无所知，因此其具体记下路途所遇诸多细节，最终留下可贵的河阳三城之形态以及由此渡河之实录。

成寻具体而微的记载，与相关记载吻合，进一步佐证了其准确性。如《泊宅编》所载：“河阳三城，其中城曰中滩，黄河两派贯于三城之间，秋水泛滥时，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唯中滩屹然如故。”<sup>[29]</sup>又据《容斋续笔》云：“又河之中泠一洲岛，名曰中滩，所以限桥。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阳王所为。以铁为基，上有河伯祠，水环四周，乔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冯襄，了无遗迹。中滩自此遂废。”<sup>[30]</sup>嘉祐八年秋季的大水曾完全冲毁了中滩城之城池。据记载，嘉祐五年时，中滩城已遭遇水患，故为中滩城屡遭水毁，难以恢复，最终“了无遗迹”。从上述记载再看成寻“隔一里，次渡浮桥”的描述，方才明白，曾经辉煌的中滩城，在洪水的多次侵袭后，在这个十一月的晴日里，一里脚程的中滩，未能给惯常事无巨细记载沿途景象的成寻留下任何印象、任何触动，因而也完全印证了张芸叟“了无痕迹”的记载。

北渡黄河后，成寻一行至“河阳驿”，再入孟州州城南门“河阳门”，但成寻未详述具体脚程，推测均不足一里，当晚在州城内广禅院止宿。第二日，返回河阳驿乘马，于孟州州城内穿行一里，从北门出，二十里后至梧桐马铺。《参记》原文为“向北行二十里，至梧桐马铺”，王丽萍校点本按：东本作“十二”，然有倒置点，今从之<sup>[21]</sup><sup>367</sup>。孟州市城北今有梧桐村，村中有明嘉靖重修观音堂无梁庙，旧名白衣堂，传说堂前旧有两株“合抱”梧桐树，与村名相合，亦可印证其村曾位居驿路要地，故向南至少二十里则可反推河阳三城北城大致方位，大致即在今孟州市南部黄河北岸大堤内滩地。大堤北侧中曹村今有黄河北岸大堤起点碑，其东邻今有堤北头村，一般认为孟州老城在该村以南数里。由此可大致推断河阳三城北城、中滩城、南城相对准确之地望。梧桐马铺距北城北门二十里、南门二十一里；元代新建之上孟州城距废弃之下孟州城十五里；孟州老城距县南古界十八里<sup>[31]</sup>；梧桐马铺距孟州老城中心约四里<sup>⑤</sup>。据数据推算，北宋河阳北城即是被废弃的金代下孟州，而河阳南城在其南数里，已在大河南岸，中以中

滩城与两组浮桥连锁，形成桥城一体的军政形态。

综上所述，所谓河阳三城，是黄河流经洛阳以北孟津渡口的河段，南北两岸由两座浮桥连锁与夹滩共同组成的三座城池的合称，三城陆续建成于北魏、东魏，初期主要担负军事职能，隋河阳县治移此后承担了重要的行政功能，至北宋时仍为交通要冲，其间三城连锁之形态、地望未变。三城之北城即下孟州，也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复置河阳县之新县城、唐宋孟州城、金孟州城，元宪宗八年后废，现遗址已沦于河滩中；中滩城，北宋嘉祐八年后废，随河道水势变化中滩原状已不存，今大致与南岸相连；南城或曰河阳县城，靖康元年城北浮桥被宋军自毁，或在金初逐渐荒废，或于金天眷年间（1138—1141年）移河清县于此，承担过一段时间新置孟津县治之角色，后因水患随孟津县治向上游徙治而废。李唐里籍之所谓“河阳三城”即此，李唐生于、长于河阳三城，往来于北、南二城之间可谓平常。

## 结 语

有论者认为，历史上的这种“双城”现象，“即一座城市的内部或外围被江河分隔为用桥渡维系着的两座分别筑有城垣的城镇，其中一座是政治性治所城池，另一座是商业市镇，二者功能不同，却共同组成一个城市整体”<sup>[32]</sup>。结合河阳三城历史和实际情况可知，北城自北魏建北中郎府起，实系“政治性治所城池”，后作为县治、使治、州治等延续至今；南城在担负军事功能之余，在战事稀少的北宋逐渐演化为渡口型商业市镇。河阳南城地居大河渡口，南来北往商贾、宦游不绝，成寻所言“南北楼门广大”，以及南城中存在的“平嵩阁”等高档宴请场所，进一步证明了河阳南城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层面上的繁荣。结合庄肃《画继补遗》中“河南人”的记载，李唐成年后很可能就长期生活在河阳三城之南城，故而《图绘宝鉴》采信“河阳三城人”表述，比“河阳人”更为准确，也并不与其自署“河阳李唐”相矛盾。《广川画跋》载李唐崇宁二年（1103年）以“画人”身份为达官显贵摹画，邀请人方宙即曾提举京西常平，掌管京西北路<sup>⑥</sup>市易、河渡等事务<sup>[33]</sup>。李唐入画院前在京城以艺为生多年，其离开家乡赴开封求职生活，时间上距成寻入华巡礼之旅道经河阳三城未远，所走驿路当与成寻所述一致。

至于李唐之籍贯，即北宋之河阳三城，简称河阳，或曰河阳镇、孟州。在中国美术史相关内容的编

撰中,李唐里籍之表述宜写作“李唐,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州、孟津一带)人”,或“李唐,河阳三城(今河南洛阳孟津)人,一说河阳(今河南孟州)人”。

注释

①1996年撤县建市,原为孟县。②今河南洛阳。③今河南孟州。④“至正本”五卷,“正德本”六卷,“借绿草堂本”八卷。⑤参见肖世孟校注:《图绘宝鉴(续编)〈续纂〉二种》前言,山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⑥今上海市松江区。⑦第四卷“宋南渡后”为南宋时期画家,附部分金代画家。第三卷为北宋,第五卷为元代。⑧以下简称《参记》。⑨今浙江宁波。⑩都穆:《使西日记》,转引自《明朝都穆〈使西日记〉整理与研究》,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⑪参见滑全熙续编的《滑氏族谱》,滑陶南作序,清道光抄本,1998年翻印本。⑫北宋永安县。⑬据笔者现场踏访,天气晴好时,从牛庄以北的旧杨沟渡、花园渡回望邙山,虎头山、首阳山北坡、山顶建筑清晰可见。⑭“町”在古日语中常用于农业测量,一町约为109米。⑮孟州老城即下孟州,距县南古界十八里,推测为当时河道之中心线。孟州城即今孟州老城。梧桐马铺即梧桐村。⑯治西京河南府。

参考文献

[1] 于安澜.画史丛书[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2] 邓椿.画继[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84.  
 [3] 庄肃.画继补遗[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8.  
 [4] 俞成.萤雪丛说[M]//全宋笔记:第7编·5.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229.  
 [5] 于安澜.画论丛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241.  
 [6] 永瑛,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962.  
 [7] 何庆先.《四库全书》载《图绘宝鉴》底本考原[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6):81-85.  
 [8]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9] 金维诺.中国美术史论集:下[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4:42.  
 [10]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227.  
 [11] 韩刚.“非曰缺文,实不敢也”:南宋人不谈“南宋画院”原因分析

[J].美术研究,2014(3):29-32.  
 [12]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13-14.  
 [13] 徐邦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伪本考辨[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2):27-37.  
 [14] 余辉.夏文彦、庄肃著述背景考[M]//翰墨辨疑:唐宋元书画家丛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121.  
 [15] 刘九洲,钱颖.南宋绘画的两大流派:《图绘宝鉴》第四卷的定量分析[J].故宫学刊,2014(1):193-204.  
 [16] 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687.  
 [17]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32.  
 [18] 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521.  
 [19]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472.  
 [20] 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163.  
 [21] 王丽萍.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2]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4656.  
 [23]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82.  
 [24]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50.  
 [2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9067.  
 [26] 中共偃师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洛阳乡镇概览·偃师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150.  
 [27] 王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  
 [28]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556.  
 [29] 方勺.泊宅编[M]//全宋笔记:第2编·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174.  
 [30] 洪迈.容斋续笔[M]//全宋笔记:第5编·5.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368.  
 [31] 孟县志编纂委员会.孟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45.  
 [32] 李孝聪.古地图上的城市:兼谈城市历史地理研究[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27-40.  
 [33] 张自然.广川画跋校注[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111.

Research on the Hometown of Painter Li Tang as “Heyang Three Towns”

Jiang Xiaochun Li Dongyue

**Abstract:** Li Tang, a prominent paint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signed his masterpieces *Windy Pines Among a Myriad Valleys and Gathering Herbs* as “Li Tang, Heyang”. *Tuhui Baojian*, compiled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by Xia Wenyan, recorded Li Tang’s origin as “Heyang Three Towns”. Although the book was published later, its fourth volume, which contain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Li Tang, was based on Southern Song sources and was considered highly reliable. “Heyang Three Towns”, initially constructed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maintained their structure of North Town, Central Tan Town, and South Town along the riverbanks through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nnected by two pontoon bridges. This was corroborated by the Japanese monk Jōjin’s diary *Pilgrimage to Tiantai and Wutai Mountains* When Jōjin passed through Heyang, Central Tan Town was already in ruin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North City was located in the Yellow River floodplain south of modern Mengzhou, Henan, while the South City was situated on the opposite bank, near Kouma Village in Mengjin, Luoyang, Henan.

Before heading to the capital, Kaifeng, Li Tang was active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Towns of Heyang. Therefore, that *Tuhui Baojian* accurately recorded his origin as the “Heyang Three Towns”, was more precise than the general reference to Heyang.

**Key words:** Li Tang; *Tuhui Baojian*; Heyang Three Towns; Heyang; Mengjin

责任编辑:何 参 之 昂